

爱因斯坦旅行日记里的中国印象

◎ 史海钩沉 □ 周维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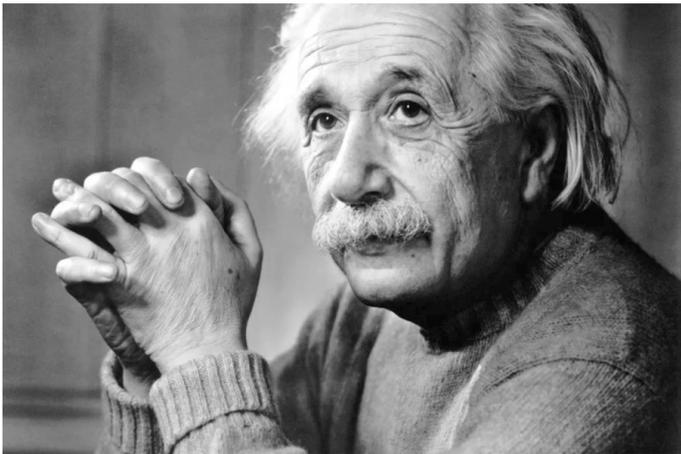
1922年10月至1923年3月,爱因斯坦夫妇有过一次“远东、巴勒斯坦和西班牙”的旅行。这一次旅行,爱因斯坦写的日记,起始是1922年10月6日,结束的日期是1923年3月12日。其间两次到过中国的上海,第一次是1922年11月13日至14日,先是从香港乘坐“北野丸”号蒸汽邮轮抵上海,停留一夜,14日下午3点从上海出发去日本;第二次是同年12月29日下午4点从日本门司坐船返程,31日中午抵达上海,停留两个晚上,1923年1月2日中午坐船启程离开上海去香港。

爱因斯坦日记里记录的1922年11月13日第一次抵达上海:“在13日早上10点左右到了上海。”受到稻垣守克(日本改造社职员、爱因斯坦访日期间的向导和翻译)夫妇、弗里茨·蒂尔(德国领事)、斐利德(私立同济医工专门学校内科教授)夫妇的欢迎,还有记者采访了他。邮轮停泊汇山码头。爱因斯坦和迎接他的人,在南京路跑马厅旁的“一品香”中餐馆用了饭。这家中餐馆位于公共租界。爱因斯坦日记里写道:“就餐期间,我们在窗外看到了一场喧闹的、五颜六色的中式葬礼,这对我们来说是(有些)未开化、几近滑稽的事件。饭菜极其精致,几乎没完没了。桌上放着很多菜碟,人们不停地用筷子从里面取食。”但爱因斯坦似乎极不适应这顿中餐:“我的肠胃反应相当激烈,后来大概在5点登陆友好的斐利德夫妇的安全港(从字面意义上理解)时,我才如释重负。”这部书给这句话的注解是:爱因斯坦此处是说他的肚子翻江倒海一般,极不舒服,到斐利德家终于解决了。稻垣守克后来发表在日文杂志《女性改造》1922年第12期上的文章《迎接爱因斯坦博士》补充了爱因斯坦夫妇在“一品香”用餐的情形,这家餐馆所在建筑是纯西洋式的楼,爱因斯坦一行总共六人围着一张圆桌就餐。博士(稻垣守克文章称呼爱因斯坦为博士)第一次使用筷子,在稻垣守克的帮助下,立刻就掌握了筷子的诀窍。但夫人爱丽莎试了一下,觉得很难,便当即放弃,改用刀叉。爱丽莎惊叹菜肴的丰富:“太惊人了,这个国家不像德国,吃的东西非常丰富啊。”但博士接口说:“不过,爱丽莎,或许也有很多人是吃不上饭的。”稻垣守克在文章里记录了爱因斯坦关于饮食的“有趣的见解”:“有古老文化的地方都会有发达的饮食。中国就是这样的。但在美国这种地方,我感觉吃饭就像是往炉子里添煤,只不过是往胃里填卡路里而已。”爱因斯坦很幽默,但他的日记所记也许表明他的肠胃不能够接受他的见解。席间窗外有葬礼音乐传来,爱丽莎认为如此欢快的音乐不适合葬礼,爱因斯坦“则反驳说并不一定如此,欧洲也有这样的例子”。爱因斯坦夫妇围绕葬礼音乐的讨论,是不是也可以说明爱因斯坦思维的发散性呢?

爱因斯坦日记里写道:“饭后,在美好的天气下步行穿过中国人居住区。街道变得越来越窄,挤满了行人和苦力黄包车,上面沾满了各种污垢,空气中弥漫着各种各样的臭味。”秋冬晴朗的下午,而市民的生活环境污浊。那这样的居住环境中的人呢?爱因斯坦接着写道:“给人留下印象的,是一群温顺、迟钝,几乎被遗忘的人在为残酷的生存而斗争。”爱因斯坦日记里说他们“参观了一个剧院,每一层都有不同的滑稽演员演出。观众总是在叫好,很满意,各种各样的人都带着小孩”。爱因斯坦夫妇这个午后游览的是老城厢的城隍庙和豫园,在“小世界”游乐场的戏院看了一场昆曲。

在上述的记录之后,爱因斯坦总结了他所见的印象:“到处都极其肮脏,非常喧哗的人群,露出满意的笑容,即便是那些像马一样工作的人也没有给人留下痛苦的印象。一群没有主见的奇特民众,经常有小小的肚子,总是很有耐性,很多时候,与其说像人,不如说更像机器人……”爱因斯坦这段日记里的几个关键词“温顺”“迟钝”“机器人”,令我们想起鲁迅笔下的麻木的人。

稻垣守克写的《迎接爱因斯坦博士》的第5节“上海观光”里说,他事先曾到上海城内考察过,以为不能带博士来这种“又臭又脏不像话”的地方,但爱因斯坦“想慢慢地仔细看看上海这座城市,而非匆匆忙忙地只看个表面,他尤其想看普通市民的生活”。稻垣守克因此改掉了他花费好几天功夫做好的安排。这样才有了爱因斯坦夫妇的上述的老城厢行程。稻垣守克的文章,补充了爱因斯坦的日记,他在文章里写道:从“一品香”餐馆出来后,“前往城内,上海的城内是中国人居住的街区,在租界外。道路太窄,汽车无法通过。我们一行便从车上下来,慢悠悠地步行”。爱因斯坦对这样的缓步访问“特别中意”,他对稻垣守克说:“这是我一生中从未想过的。”“我无法表达,太新奇了。”爱因斯坦“兴致盎然地走着”。“街上越来越臭”,稻垣守克说“太脏了吧?”爱因斯坦“却不介意:‘哪有,这不算什么,意大利的街上也铺着这样的石头。’”。在戏院里,观众饶有兴致地看着爱因斯坦一行人,爱因斯坦“于是笑道:‘我们也是戏呀。’”。在“小世界”里的玩具店,



爱因斯坦

“有个人在弹大正琴”,爱因斯坦“站住,静静地闭眼听了三四分钟”。“大正琴”即“凤凰琴”,上世纪20年代自日本传入中国。他们从城里出来,爱因斯坦边走边沉思,稻垣守克问爱因斯坦的感受,爱因斯坦的印象是这些人“只能说是没有自我意识吧”。稻垣守克记录的这句话和爱因斯坦日记里的记录,可作相互印证。

这天晚上爱因斯坦夫妇是在王一亭家里用餐。王一亭的宅邸位于小南门外乔家路113号,这里也是上海的老城厢。王一亭事母至孝,因母亲不习惯城市喧嚣,遂购置小南门外乔家路113号梓园入住。梓园,清朝康熙二十一年(1682)由进士周金然构筑,至1922年已240余年。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王一亭购入,保留了原来的青玉筋、琴台、归云岫诸胜。因园中有古梓,故易名梓园,园的规模不算大,但构造精致。全园以荷花池为中心,池中植莲、养鱼,又有仙鹤、白鹅遨游其间。四周多奇葩异草,花木扶疏,山石嶙峋。池中筑亭,可供憩息。园东临街处建二层楼住宅,楼上卧室,楼下分别为客厅、书房、画室,十分宽敞。王一亭作为画家,自然藏有历代名画和自己创作字画的精品。按照当年《民国日报》的报道,王一亭宅院可算“中国家庭寓所的典型代表”,由他来接待爱因斯坦,“假王一亭寓邸,设宴欢迎”,正是“藉便博士观中国家庭情形,并赏览中国艺术品”。

王一亭祖籍浙江吴兴(即今之湖州),出生在上海周浦,既是实业家,也是书画家,是吴昌硕的老友(梓园的门额即由吴昌硕题写)。1922年,王一亭被选为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这一年王一亭55岁,爱因斯坦43岁。爱因斯坦在日记里称王一亭为“一位富有中国画家”。王一亭的梓园在爱因斯坦的笔下散发着浪漫的艺术气息:“进到房子里面,浪漫的庭院边上的走廊点缀着过节气才有的灯火,里面有一个优美如画的池塘河花园。大厅里装饰着主人丰富多彩的真正的中国画以及他精心收藏的古董。”王一亭设宴家,隆重地接待了爱因斯坦夫妇。作陪的有浙江法政学校教务长应时和他的夫人章肃及女儿应惠德,他们都能说德语。爱因斯坦日记里说他们的这位“大约10岁的漂亮小女儿,她用德文和中文朗读,讨人喜欢”。上海大学校长于右任,曾任教国立北京大学、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侄子,1923年当选为浙江省教育会长,兼任浙江省立工业专门学校化学教授也陪同在座。爱因斯坦日记可见,这是一个和前述城内华界完全不同的人与环境,“食物无穷无尽,极其精巧,让欧洲人难以想象,彻底堕落的享乐”,“主人的脸庞非常精致,像霍尔丹(Haldane)……那位朗诵的小姑娘的母亲充当女主人的角色,用德语聊天,相当诙谐和流利”。庭院优美,食物精致,人都优雅有教养。爱因斯坦说自己也做了一个发言,日记给出的注解说:于右任和爱因斯坦的晚餐谈话发表在1922年11月14日《民国日报》上,爱因斯坦在他的讲话中,表达了对王一亭艺术的钦佩以及他相信中国青年未来对科学的贡献。稻垣守克的文章《迎接爱因斯坦博士》写了王一亭家晚餐时,王一亭和爱因斯坦之间的一个问答。王一亭问:“太阳和地球有没有可能相撞?”爱因斯坦的回答是:“不能说没有,根据详细计算,可以认为地球和太阳在逐渐靠近,不过这是极度微小的,反正没有担心的必要。”这也算留了一段掌故吧。

爱因斯坦这一次在上海还游览了龙华寺,日记里称是“一座有趣的佛寺”,还访问了“一个极其有趣的小村庄,完全是中式的,有着十分狭窄的小巷和敞着门的小房子,到处都是小商店和作坊……除了污秽和臭味,一路上几乎自始至终是令人愉快的印象……”龙华寺在城外的两英里处,稻垣守克的文章补充了爱因斯坦在这儿的所遇,龙华寺驻扎了军队,门口有哨兵,爱因斯坦一行走进门口的时候,“哨兵举起刺刀气势汹汹地说着什么。大概是‘什么人?这里不许通行!’诸如此类吧”,稻垣守克说:“世界级学者爱博士与一脸无知的督军手下小兵形成有趣的对照。”他们后来在另

一个人口付了一元钱得以进入。稻垣守克的文章里记录爱因斯坦仔细研究龙华寺的建筑,“看到五百罗汉,他一个一个地研究着他们的面容”。

爱因斯坦夫妇第一次来上海的晚上,仍然是在“北野丸”邮轮上住宿过夜。这在爱因斯坦的日记里没有记录,是稻垣守克《迎接爱因斯坦博士》一文“归船”这一节里记下来的。

爱因斯坦夫妇第二次到上海,是在结束了日本的访问行程之后,1922年12月31日抵达上海,被安顿在盖顿位于杜美路9号的家中。他在日记里称盖顿为“暴发户”,“爱炫耀”。爱因斯坦在这几度过了除夕,“我坐在漂亮的来自维也纳的女士旁。除此之外,嘈杂无比,对我来说,悲哀”。1923年1月1日的日记里爱因斯坦这样写道:“上海,令人不快。被中国仆人围着的欧洲人是懒惰的,自负而浅薄。”爱因斯坦在这儿对在部分欧洲人的批评也是严厉的。接触到在上海的英国人,爱因斯坦写道:“友好的英国人,有国际思想。”爱因斯坦这一次参观了“中国人的大众娱乐场所”“熙熙攘攘的闹市”“一座小庙”和“市郊”,日记里记录的观感:“中国人肮脏,饱受折磨,麻木迟钝,心地善良,可靠,温和,而且还——健康。所有人都异口同声在赞扬中国人,但涉及商业技巧时,也一致认同他们智力低劣,最好的证据是:在同样的岗位上中国人得到的工资只是欧洲人的十分之一,即便如此他还是竞争不过欧洲人。”1月2日中午,爱因斯坦夫妇乘船启航,离开了上海。

这部日记的编者泽夫·罗森克兹在《历史导读》一文里说爱因斯坦对中国人的看法明显充满了矛盾:“他既同情他们所处的悲惨境地,又在一系列非常令人不安的言论中将其非人化。他似乎真的担忧中国人可能会取代世界上其他所有民族。”罗森克兹的分析是,爱因斯坦所持印象与刻板模式,同自19世纪50年代开始在西方世界流行的关于中国的负面形象高度一致。这是一个方面,但换一个角度来看,爱因斯坦的认识,亦未尝不是令我们借他人的眼光来观察自己,来自自省。(《旧唐书·元行冲传》有句云:“当局称迷,旁观见审。”)胡适1930年4月在《新月》月刊第二卷第十期上发表《我们走那条路?》,提出了“五鬼”闹中华的说法。胡适说的“五鬼”即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胡适说这“五鬼”也是“五大仇敌”“五大恶魔”。他开出的药方是教育。陈方之1934年12月商务印书馆出版《公共卫生与卫生行政》,胡适写的序言标题为《公共卫生与东西文明》,呼吁“公共卫生是‘人的文明’的第一要务”。这也可以看作是国人的一个“内自省”吧。胡适的这个自省和爱因斯坦的旁观,对照起来看,也是意味的。

爱因斯坦1922年11月13日抵达上海时,接到瑞典皇家科学院秘书克里斯托弗·阿伦尼乌斯发来的电报,得知自己被授予1921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在这之前,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已经名满全球。可惜的是,两次上海之行,爱因斯坦都没有做过有关相对论的学术演讲。而他的日本之行,日方负责邀请和接待的改造社做了周密的安排,一份正式的邀请函,一份和爱因斯坦签署的合同,合同包括了在东京进行的6场科学讲座,在日本多个城市的6场通俗讲座,酬金含差旅费、住宿费总计2000英镑。爱因斯坦虽然也曾有意访问北京或一些沿海城市作演讲,但可惜中国方面没有能够和爱因斯坦沟通和衔接好,爱因斯坦的中国讲学之旅搁浅了。

这部《爱因斯坦旅行日记》的中文译本,2022年11月已由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这一次旅行,爱因斯坦1922年11月2日在新加坡招待会上的演讲中说,东道主“对我的理论的溢美之词着实不应当加之于我,而应加之于上世纪的全部科学家,我所取得的这一理论成就就是几个世纪以来科学进步的结果”。他在日本访问时也说:“自己成为天才只是偶然之幸,可以说是上天不公平的恩惠。要尽可能地把这个恩惠返还给人们”。真是又伟大又谦虚。

◎ 史林偶拾

不在别人的褒贬声中迷失自己

□ 任万杰

王无咎是王铎的儿子。王铎可不简单,他是明末清初大臣,善书法,与董其昌齐名,有“南董北王”之称。书法作品有《拟山园帖》和《琅华馆帖》等。受家庭的影响,王无咎也酷爱书法,特别是行书用功很深。

书法爱好者们有时候会坐在一起,大家都贴出自己的书法,等着别人来点评,有时王无咎聚会上贴出自己的书法,那些喜欢王无咎字的人,就会不住地夸奖王无咎的字,说他的字旷古绝今,世间少有绝对是大家,必将流传后世。

听了这些褒奖之词,王无咎就会高兴地回家,和父亲王铎吹嘘一番,王铎只是平静地听着。有时聚会,王无咎会遇到不喜欢他字的人,会说他的字简直侮辱书法两个字,无论下笔还是力度简直无一

可取之处,毫无前途可言。听了这些贬损之词,王无咎就会悲伤地回家,见到父亲也是无精打采,说了今天的经历后不住地叹气,王铎依然静静地听着。

有一次,王无咎好几天不动笔,王铎来看他,王无咎指着他的书法问王铎:“父亲,我的书法真的那么差吗?”王铎摇了摇头。

王无咎眼前一亮问:“真的那么好吗?”王铎依然摇了摇头,王无咎不明白,王铎说:“还可以,仅此而已,书法就和做人做事一样,我们不会那么高,也不会那么低。”

王无咎想了想儿子记下了,然后不再关注别人的评价,一门心思练习行书,最终小有成就,行草《玉书过箕山》成为代表作,被大家所记住。

我们往往既不像爱我们的人说的那么完美,也不像恨我们的人说的那样一文不值,始终把自己放在可接受的位置,不要在别人的褒贬声中迷失自己。

黄永玉痴荷

□ 冯忠方

著名画家黄永玉被称为“荷痴”,在于他画的荷花独树一帜,神韵盎然,十分被人称道。可是有谁知道,他画过多少张荷花写生稿呢?连黄永玉自己也算不清。

有一次,黄永玉叫儿子数一数究竟画了多少张荷花写生稿,儿子抱来一捆一捆的荷花写生稿,每捆100张,总共有80多捆。黄永玉幽默地说:“这叫做荷花八千。”并以此为印文,请一位篆刻家为他刻了一枚压角闲章。

在中国书画界,黄永玉“荷痴”的雅称,首先得益于家乡文化的熏陶。黄永玉家乡湖南湘西是莲荷之乡。在黄永玉很小的时候,他的外婆家门口就是一个荷塘。那时候,他眼里的荷花有着奇妙的生命张力,他奇怪为什么在水草杂陈、污泥遍布的水塘里会生长出这么圣洁的生命。为了仔细观察这些荷花,有时,他会在荷丛里一动不动地待上两三

个钟头。

但黄永玉真正与荷花结缘却是在“文革”时期。傲然展蕊的荷花显得分外高洁清逸,那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气节品性,成为黄永玉逆境中启迪心智的精神支撑。于是,黄永玉一有闲暇就去荷塘赏荷,一连几个小时守着花开花合,从用心灵捕捉到用画笔描绘,经过几十年刻苦的写生,画出水芙蓉、雨中荷花、含苞待放的荷蕾及各种神态不一的荷花。同时,他反复钻研画荷花的技巧,吸收各大家长处熔于一炉,独创一格。因此,他画荷花一挥而就,并独具神意。

有一回,黄永玉叼着烟斗,把烟斗嘴指着自己的脑袋,诙谐地对友人说:“荷花神态,全在我脑中。”此话确实不假,黄永玉不断地写生,不断地琢磨,不断地提高,画荷技艺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将“荷花八千”集于脑中,画荷当然不仅娴熟,而且神而化之。

朱光潜先生的豁达

□ 唐宝民

朱光潜先生是美学大家,同时也是个豁达的人。他的豁达与博大一直被人们铭记在心。

美学家李泽厚1954年毕业于北大哲学系,他在《悼朱光潜先生》一文中说:“我和朱先生是所谓‘论敌’,五十年代激烈地相互批评过,直到朱先生暮年,我也不同意他的美学观点。这大概好多人知道。但是,我和朱先生两个人一块喝酒,朱先生私下称赞过我的文章……我那第一篇美学文章是在当时批朱先生的高潮中写成的。印成油印稿后,我寄了一份给贺麟先生看。贺先生认为不错,便转给了朱先生。朱先生回信给贺说,他认为这是批评他

文章中最好的一篇……被批评者却如此豁达大度,这相当触动我。”

1960年,在北大召开的一次“人性论”讨论会上,夏昉先生当面反驳和批判了朱光潜在会上的发言,然而,后来当西语系要给朱先生从本系年轻的助教中挑选一名助手并征求他的意见时,朱先生却主动提出由夏昉来做他的助手。夏昉感慨道:“我简直惊呆了。我没想到朱先生如此豁达大度,毫不计较我过去对他的冒犯,还有心收我为弟子,真让我有些受宠若惊。”

朱光潜先生就是这样一个胸怀宽广的人,这样的人处世原则,值得我们在人际交往中借鉴。

评书泰斗知难而退

□ 张达明

评书泰斗陈士和先生从1912年拜师开始学说《聊斋》,从此说了一辈子《聊斋》。他所说的《聊斋》,同情善良百姓,褒扬正直诚实,嘲讽贪官污吏。他的台风大方,口齿清楚,语言生动,并善于制造悬念,引人入胜。他讲述的《聊斋》书目约有50余篇,深受京津听众的欢迎。

无论何时上场,也无论听众多少,陈士和每次演出都为认真投入。当说到紧要三关处,也是最出彩的时候,只见他惊堂木一拍,紧跟着一口气喷出来,那把长长的白胡须瞬间被喷得飘了起来,听众便情不自禁地大声叫好,掌声也随之如暴雨般响起。每当到了这时,也是陈士和最得意、最能抖起

精气神的时候,后面的故事就会越说越精彩。为此,他自豪地说:“能得到听众的认可,这辈子知足足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陈士和深感体力不济,多次萌生退下来的想法。上世纪50年代的一天,他应邀在北京某书场演出,说到紧要关头时,也就到了亮出绝活的精彩处,当惊堂木落下,紧跟着一口气喷出,接下来就该白胡须被喷得飘起来,意外的是,此时白胡须偏偏没有飘起来。陈士和虽然嘴上没说什么,听众则看出了其中的端倪,纷纷小声议论道:“老爷子体力不济了。”散场后回到家,陈士和喝了两大杯“二锅头”,自言自语道:“真到了该交班的时候了。”当下便辞掉了第二天的演出,从此告别书场,把祖师爷留下的这碗饭交给了晚辈。

◎ 老照片

每一幅照片背后,都有一个故事
每一个故事后面,都有一段历史



19世纪的温州江边码头

照片摄于1877年,是英国驻温州的首任领事阿尔巴斯特在温州华盖山上,遥望东门永川路浦边码头时拍摄的。从照片上看,当时码头上停满了大大小小的船只,岸上是成片的古民居。
照片提供者:江新诗